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THE OPEN EMPIRE

开放的帝国

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美] 芮乐伟·韩森 著

梁侃

邹劲风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海外中国
研究丛书

刘东主编

THE OPEN EMPIRE

开放的帝国

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美」芮乐伟·韩森 著

梁侃

邹劲风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开放的帝国:1600年前的中国历史/[美]芮乐伟·韩森著;
梁侃、邹劲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3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刘东主编)

ISBN 978-7-214-04600-0

I. 开... II. ①韩... ②梁... ③邹... III. 中国—历史
研究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9531号

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 by Valerie Hansen

Copyright ©2000 b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irst Edition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rights ©2007 by JSPPH

This work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W. W. Norton &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0-2004-138

- 书 名 开放的帝国:1600 前的中国历史
著 者 [美]芮乐伟·韩森
译 者 梁 侃 邹劲风
责任编辑 王保顶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book-wind.com>
集团地址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南京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1304毫米 1/32
印 张 13 插页2
字 数 370千字
版 次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4600-0
定 价 2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决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

刘东

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中文版序言

我感到幸运的是,美国人对于中国和中国历史怀有极大的兴趣。同样地,中国的普通百姓和学者也关心美国人如何理解中国的历史。在我的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生涯里,许多中国人帮助我学习讲中文,阅读古汉语,帮我寻找资料,当然最困难的是帮我理解那些原始资料。

我的第一堂中国历史课,是在上高中的时候。当时我们高中一位最优秀的老师,在暑假进修了东亚历史的研究生课程后,来给我们毕业班开设中国和日本的历史课。那门课极为精彩迷人,不过也其难无比。有一个月的时间,我走到哪里都揣着一张纸片,上面写有洪秀全名字的拼音。专心致志地学习,我就能记住如何拼写一个外国人的全名。

在学中文之前,我就已经迷上了中国的绘画和文物。记得高中的最后一年(1974—1975年),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举办了首次大型的中国出土文物展览。我在展览馆中徘徊几个小时,为展品的数量和精美深感震撼。我对一尊秦代的陶土女性坐像反复观摩,心中实在十分好奇。我的这本书也把艺术作为史料,因为艺术很直接。

多年前我从耶鲁大学休学术假,住在北京,开始了本书的起草写作。几个星期里我全家的作息也因为我在家写作而作调整。正如我未满两岁的小女儿克莱尔说:“姐姐坐校车,爸爸坐出租,妈妈坐在家工作。”当我在琢磨如何婉拒邻居的邀请时,刚满五岁的大女儿莉迪亚直

截了当地对人说：“我妈妈正在写一本书，我们下午四点以前不空！”我丈夫杰姆对我支持是多方面的，尤其是鼓励我写一本能引起大众兴趣的历史书。

北京大学中世纪研究中心的几位老朋友和同行邓小南、李孝聪、荣新江、臧健等，对我提供了资料上的帮助并解答我的问题。李孝聪最近告诉我，外国人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与中国国内对中国史的研究完全是两个领域。外国人提的问题不同，并用非传统的方法来回答问题。

本书是根据我在耶鲁开设的《中国古代史》基础课的讲稿修改而成的。我的学生多数不懂中文，也未学过中国史。他们或许听说过孔子、马可·波罗，如此而已。我的目的是让他们知道中国漫长历史的梗概，并不要求记住许多细节。除了这本教材，我也布置学生阅读翻译的原始资料（中国读者们可能会惊讶众多的中文书籍已经被译成英文，而且常常被多次翻译）。学生在课程开始学习儒家、道教及佛教的基本主张（分别在第2-5章中介绍）。到学期末，他们能解释明代的《十诫》中哪一条为什么最难以接受（见第10章）。

本书的最后定稿得益于来自学生、助教以及许多大学同行的意见和建议。我要特别感谢西雅图大学梁侃和南京大学邹劲风，放下他们自己的研究，找时间把本书翻译成中文。翻译花费了比他们预计的时间长得多（两年多时间）。在此其间邹教授生了孩子，可是她仍然坚持翻译不辍。

本书强调，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是如何取决于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而且这种认识的变化又是那么迅速。我尤其要感谢博学的吴百益教授。吴教授仔细地阅读了最后的书稿，并指出了很多错误。当然，我知道现在书中还存在不少错误，也希望中国的读者能写信到耶鲁给我指正。吴教授在读完书稿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把书籍比喻为军事要塞，学术专著就如同城墙内的城市，建立在坚实的研究基础之上。相反这本书稿，他机智地指出，则是建立在大量他人研究的成果之上，就如同敞开的院子，可以受到从任何角度来的攻击。对我来说，之所以要写一部涵盖三千年的历史书的一个理由，是因为有必要把某一

特定时期我们的知识状态记录下来。我们完全知道,在这迅速发展的领域,书中所说的很多内容或许很快会受到挑战和修改。

韩森 2006年8月2日于康涅狄克州纽黑文

在中国文明开始之际，中国人就已经在撰写史书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胜于我们了解世上任何其他文明的历史。因此，很难想像本书还会给悠长而记载丰富的中国历史再添点什么。然而，每年令人兴奋的考古发现都在不断地增进我们的知识。而这些新的信息所提供的启发性的领域，一直以来都为传统史家在书写 1600 年以前的历史时所忽视。传统的宫廷史官撰写的编年史，是自上而下关于帝王将相的历史，却几乎完全忽视普通百姓、非汉族的少数民族，以及经济和社会变迁的历史。而这种变迁，事实上对中国历史中以朝代为分期的方法构成了有力的挑战。

考古新发现促使史学家们重新思考、认识和组织中国历史的方式。比如，“中央王国”是否总是对非汉族的外来者怀有敌意？崇山峻岭和西部一望无际的沙漠使得中国地理意义上的边疆充满了险阻，这一点确保了只有少量的外国人来到中国以及少量的中国人去往外国。而这些历经艰险的旅行者确实从域外带回了知识和技术，比如佛教本是印度的信仰体系，后来在中国发展成为国教之一，这一惊人的成功，证明了古代中国人对外来宗教是如何的开放和包容。

本书的目的

4 本书打破中国历史的传统模式,即在历史文献中夸大皇帝的重要性,轻视社会其他群体贡献的所谓王朝循环模式。传统的王朝历史在本书中仍然存在,但只是叙述的一个方面,而不以之掩盖中国历史上对日常生活产生更大影响的其他趋势,如佛教的引入、丝绸之路带来的思想和技术的交流、妇女角色的演变、普通百姓对冥界生活认识的变化,以及蒙古的征服等等。本书解释了为何近年来精彩的考古发现使历史家们对过去的定论重新反思。同时,本书特别重视包括文学和非文学作品在内的有关妇女和家庭生活的著述。此外,本书利用尽可能获得的图像资料,更为生动地为读者呈现本书所涵盖的漫长历史中的显著变化。

这种新的思路,导致了不同于读者可能期待的对 1600 前中国历史的新认识。这些资料描述了这样一个帝国:它在形成之时便融合了不同的地区和民族,并在漫长的历史中保持对外来影响的开放,而不是一个拒绝外来影响的中央王国。我们会看到少数由于其自身成就而声望卓著的女性,还有更多能干的管理着家族基业的妇女,尽管看似荒谬的是,她们甚至还缠着足。由于早期的西方学者只关注宗教教义,因而他们相信每个中国人都只信仰一种宗教,或道教,或儒教,或佛教。然而,考古新发现和文献材料都证明,人们实际上可以同时信仰上述三种宗教,甚至同时还相信经典宗教文献里没有的有关死后生活的其他信仰。

佛教在公元 3—6 世纪中国王朝的分裂时期进入中国,在隋(589—618 年)、唐(618—907 年)两代继续发展。王朝循环模式假定所有重要变化都发生在一个朝代里,而佛教的发展过程则与该模式并不完全吻合。汉朝(公元前 207—220 年)的官方历史记录(《后汉书》)引用了一份皇帝的诏书,该诏书提供了若干有关佛教的最早证据。可是,如果我们只依据这些传统史料,便无法正确评价佛教传入的影响,事实

上,它对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深远影响要远甚于一个朝代的更替所带来的变化。

佛教的传入只是官方史书所忽视的中国历史上诸多变化之一。中国古代官僚编修史书是为其他官僚服务,他们心中所想的也是他们的皇帝。官方史书是在由朝廷官员编纂的王朝档案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这些史书大部分的篇幅都用来记载官员心目中最重要群体的历史,即皇帝、重臣和下层官员的历史。因此,它们所反映的多为国家政权所关注的问题,如皇帝的健康及他的帝国的所有问题。这些史书也记载了士大夫官员之间对于税收、强兵、济民、吏治等问题的讨论,以及皇帝、摄政、奸臣、宦官等对权力的滥用。

王朝循环模式

以王朝循环模式看待中国历史往往会有这样的套路:开国皇帝总是强有力的。开国之君总能获得充分支持来进行税制改革,因而有足够的军饷支持一支强大的军队去征服广袤的疆域。继任的皇帝则难免缺乏开国之君的魄力,于是权力渐渐落到宦官、大臣、将领及外戚手中。到了王朝晚期,末代皇帝们就理所应当地被推翻。按照这个王朝循环模式,末代皇帝通常昏庸无能,对丢掉本朝江山负主要责任。而下一朝新君登基后总是马上命令其官员撰写前朝昏君的历史。这一僵化简单的模式具有一些吸引力,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总是为统治王朝的统治者进行辩护。

王朝循环模式有很多不足之处,其最甚者是盲目接受一个朝代的自我界定。我有位同事讲了一个不太可信的故事,一位通史课老师提出了这个观点,在学期快结束时,有位学生问这位很有名的教授:“什么是王朝?”整个课堂哄然,以为该学生居然没有弄懂课上最起码的常识。然而教授很礼貌地问那位学生是想要一个长的答案还是一个短的答案,如果是短的答案,王朝自然指的是一个家族的成员世代掌握皇位。

长的答案则需要更为复杂的分析。王朝是一个虚构的框架,它允许包括非皇室成员在内的各色人等获得权力,但始终维护皇室家族表面上的持续统治。中国第一个长久的皇朝——汉朝(公元前 207—220 年)的历史很好地解释了这个概念。在这个皇朝之初,刘邦(公元前 206—前 195 年在位)击败秦朝皇帝,建立汉朝。刘邦死后,来自于另一个家族的吕后没有支持她的两个儿子上台(其中一个据传被她谋害),而是自己掌握了朝政。她死后,两位忠臣成功地将皇位归还刘姓家族,使之又统治了一个世纪,直至另一位摄政掌权。到公元 2 世纪,外戚和宦官争权成为历史模式,皇帝形同虚设。然而,刘姓家族统治国家的说法一直继续着。

尽管刘邦的子孙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仅仅是傀儡,但这个 400 年的时期都以汉朝的名义存在。中国的历史学家使用朝代的名称,因为这些名称是有用的组织概念。但术语的便利不应该妨碍我们认识到王朝名称中包含着的虚构性。

由于过于注重宫廷内发生的事件,王朝循环模式假设朝代与朝代之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传统宫廷史官惯于将这些过渡阶段描述为混乱与分裂的时期,直到以武力重新统一国家,混乱才告结束。如果我们也以传统宫廷史官的视角来看 20 世纪的中国,那么会将 1911 年清朝解体至 20 世纪末看成一个混乱分裂的时期,因为中国直至现在还未实现完全统一。

然而,如同历史一再呈现的那样,混乱与分裂常常带来生机和创新。20 世纪的中国大陆及香港和台湾地区,虽然没有统一,但却经历了令人目眩的经济增长,取得了骄人的工业化和普遍的农业现代化,更不消说人民生活和思想的深刻变化。

因此,那种认为中国文明只有在统一时期才到达其鼎盛的观点,应该值得怀疑。我们需要重新考察那些被遗忘、却富有朝气的朝代之间的过渡时期。本书重新反思关于大一统益处的流行假设,希望带来一些新的启示。而对重要朝代之间的过渡时期实质内容的理解,将有待于长期艰苦的研究和考古工作。

考古发现资料

20世纪初以来，中国考古学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发现。在西安郊外发现的守卫秦始皇陵墓的兵马俑只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最早发现的甲骨文，本书第一章便无法描述最早创造书写文字的人类社会。甲骨文被刻划在牛肩胛骨或者龟贝上，记载了古代君王求神占卜的结果，其内容涵括了一个国家从对敌战争到君王本人健康的所有事务。传统史家列出了中国第一个王国——商朝^①的君王谱系，似乎商朝同后来的朝代是一样的。但若仔细研读这些早期的文字记载，就会发现商朝君王们统治的其实只是一块相当小的地盘，大概也就200公里(125英里)的跨度。 7

考古发现如何促使历史学家反思官方史书对事件的记载，秦汉之间的过渡可谓最为清楚的例证。传统史家将秦始皇描写为暴君，他的残暴统治导致秦朝被推翻。然而考古发掘在一位听取讼事的低级官吏的墓穴中发现了秦朝的一份法律手册，证明同传统的观点相反，秦朝执行刑律相当严格：秦朝刑律明确区分故意杀人和过失杀人的不同，以及合法溺杀病残婴儿与非法杀害健全婴儿的区别。这个考古发现表明，汉朝的开国皇帝之所以成功地领导农民起义反抗秦朝，并非像早期史家所说是因为秦始皇不得人心，而是因为人民反对他选择无能的第二个儿子继承皇位(见第3章)。

考古发现也显示出中国人如何理解来世。学者总是能以佛教和道教文献以及文人的观念来研究人们对死后的看法，但是最近发现的墓葬使我们能够了解人们在他们墓中究竟放些什么东西。秦朝时，如兵马俑那样的陶制模型，已经代替了早期的殉葬品。我们从湖南省马王堆的公元前2世纪汉代贵妇人墓中可以看到，在墓内的起居室里摆放着她的家具，其他3间房内则存放着48只竹箱，装有她打算带往另一个世界所需的物品。更重要的是，墓内还有一T字形的横幅，将她描绘成一位拄杖行走的老妇。这幅中国最早的历史人物肖像，给我们提供 8

了有关佛教进入中国以前人们对于死后信仰的一些资料,而这种信仰在文献资料中是看不到的。

文学资料:对小说的利用

除了官方史书和考古发掘资料,本书还从各种非官方记载追踪历史过程中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状况。其中有些资料,特别是小说记载,是史家们早已熟悉但不予利用的资料,原因是这类资料不属于传统的史料。

早在公元前 1000 年,中国的农民们就用民歌唱出他们的劳作、他们的爱情和背叛,以及他们的宗教生活。这些民间歌谣后来被编成了《诗经》。后来的男女作家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告诫子女如何持家,描述他们自己的婚姻,嘲弄当时的迷信,甚至影射和讥讽朝政。10 世纪后,雕版印刷的传播使书籍流通数量大增,文学作品的数量和种类也显著增多。对于能阅读中文的人来说,这些资料随手可用。而近年来的大量翻译,使西方读者也能利用这些资料。由于这些资料的生动性,本书会经常从原始资料里引用长篇的译文。^②

一些杰出的妇女,包括中国第一位女史学家、第一位女诗人和第一位女艺术家,都留下了文字遗产。然而,绝大多数妇女没有留下永久的记载。皇朝历史一般很少记述妇女,除非某位妇女握有朝政,比如皇帝的遗孀或叛军的首领,如蒙古人占领前的一位女子(见第九章)。迫于解释 684—705 年在位的武则天如何坐上皇帝宝座,传统史家们能做的只是指责她乖异的性行为。而我们现在知道,她利用丈夫唐高宗久患疾病的机会安插她的族人进入朝廷高位,从而支持她取得权力。

本书大量使用未经其他材料证实的文学资料来探究妇女的生活。12—13 世纪时期,中国处于游牧民族的征服统治之下,当时戏曲对于男女关系的描述,为别类史料所未有。文学和史学界的一些学者非常反对如此运用小说来描述历史。这些批评家认为,这些作品只是文学

创作,不能将文学作品当作现实生活的真实描述。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对的。几百年以后,如果有位天真的历史学家完全依赖情景戏剧或肥皂剧撰写历史,确实会得出歪曲战后美国生活的观点来。但是,即使是纯粹主义者也必须承认,电视剧本中确实包含了《国会记录》中所没有的信息。同样,中国古代的小说里也包含了官方编纂的历史中所没有的有关妇女的信息。

本书的好几章都提到了一位特别的小说主人公——莺莺。许多学者相信她有真实的人物原型,即被作家元稹(779—831年)所遗弃的情人。元稹曾写了一篇怀念她的短文(见第6章)。在最早的故事里,莺莺在未婚的情况下就和她的情人同床。当他拒绝她后,她又同另一个人结了婚。莺莺这个人物出现后显得十分突出,后世的戏曲家们不断重新撰写她的故事,以迎合他们所处时代对于妇女的主流观点。12世纪时,莺莺成了缠足女子;而15世纪时,戏曲家们则大肆指责莺莺的婚前性行为。自莺莺首次出现的9世纪后,妇女的生活的空间日益收缩。本书提到其他小说中的妇女人物形象,是因为塑造这些人物的作家们都尽力将她们置于真实的生活场景中进行描述。显然,人物的服饰、住宅和其他方面的细节越真实,读者就越相信小说中人物的真实性。

艺术资料:绘画反映了什么

基于同样的原因,本书也从艺术资料中取材以补充历史记载之不足。很多中国最有名的绘画,如花鸟画,描绘了想像中的山水和自然。鉴于这类绘画很少涉及人间世事,本书偏重于分析少数存留下来的反映真实世界的图像。此类图像始于公元前一千年的青铜器。尽管佐证文献的缺失给分析带来困难,这些青铜器还是喻示了当时人们对于少数民族、日常生活和礼仪的观念。后世的绘画描述了更多不同的主题。其中最为真切的,是一幅12世纪的5米(16英尺)长卷《清明上河图》,极其逼真地描述了一座城市及其周边的景象。《清明上河图》

描写了一个没有饥饿、痛苦、贫困,更不可思议的是,一个没有妇女的城市。

9 本书将视觉材料作字面意义的解释,是有些风险的。但这个风险又是值得的,因为艺术所揭示的古代中国的视觉形象世界,即便不是真实的,也反映了艺术家所认识的世界。

本书的结构

本书呈现的中国历史,在时间上始于公元前 1200 年最早文字的出现,终于 1600 年(明万历二十八年)耶稣会士到达中国。为了更好地理解历史,本书将中国古代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构建中国(公元前 1200—200 年)、面向西方(200—1000 年,魏建安五年至北宋咸平三年)、面向北方(1000—1600 年,北宋咸平三年至明万历二十八年)。

第一部分:构建中国

中国的传统史家推崇商朝以及其后的周朝(公元前 1045—前 256 年),将之列入王朝系列,并将之归结为统一进程中的中国。不过我们必须对此提出质疑,因为现存的资料只为汉语使用者的观点提供文献证据,而居住在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辖区内的古人并不只有汉族一个民族。尽管文献记载不完备,但其他族群也确实对中国历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与今天相对单一的中国社会不同,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笔下的古代中国由众多不同的族群组成,包括不说汉语的人以及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农耕民族截然不同。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上中国境内的其他民族。江西和四川均发现了至今未能解读的文字。一旦读懂这些文字,我们对古代中国的理解就会发生重要的变化。令人激动而又困惑的四川三星堆遗址(见第 1 章)显示了虽无文献记载,但同样高度发展的民族,它们与早期有汉语文字记载的王国处于同一历史时期。但在多个世纪之后,随着汉族征服越

来越多的领土,原住民的踪迹就更少见了。

即使在文献资料极其零碎与罕见的早期,我们仍然能发现非汉族人民对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贡献。对于后人来说,写汉字的人征服对手似乎是很自然的事。其实,在公元前 221 年中华帝国形成之前的上千年的战事中,没有什么是必定的。商朝使用古代汉语来记载历史,并在历史记载中轻视他们所逐步征服和同化的非商朝人的作用,而不管他们是否说同商朝人一样的语言。发现与确定非汉族人民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中最有意义的新领域之一。研究者已经利用考古学、语言学和脱氧核糖核酸(DNA)等所有的新方法来从事此项研究。 10

这个时期的戏剧性结尾,是公元前 221 年中国大地第一次统一在秦王朝治下。虽然秦朝仅有短暂的 14 年,但这个短命的王朝还是统一了全国的度量衡。建立在秦朝基础上的汉朝,领导了长达 4 个世纪的统一帝国。到了汉朝末年,汉族已经征服了大部分的中国领土,而将非汉族族群驱赶到帝国边缘的遥远山区。汉朝在公元 3 世纪败亡,但中国广袤的土地已经为汉族人口占领,并且汉人也从此控制了历史记载。甚至有关这段时期的考古发现,在区域多元化方面,也显得比本时期开端时更为稀少。

第二部分:面向西方

公元 2 世纪,第一批相当规模的佛教徒从印度与中亚地区来到中国,标志着一个新时期的开始:中国面向西方,面向印度和中亚。佛教僧侣的到来,同有组织的道教的兴起几乎同时。而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和地区都有众多的信徒。佛教的传入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19 世纪之前的中国人尤其是受佛教影响者,承认他国文明的优越性。印度是佛祖的诞生地,也是佛教的中心圣地。中国的僧人从陆路和海路到印度取经,在那里长期居住并攻读梵文和佛教经文。在这段时期里,许多重要的佛教经典被译成中文,中文里的梵文外来语至今仍在使用。

法显(活跃于 350—414 年)是第一位记录其取经之旅的僧人。当他
11 在 5 世纪初到达印度时,在北印度受到当地主人的欢迎:“奇哉!边国
之人乃能求法至此。”在他们看来,中国确实是遥远的边地国度。14 年
以后,当法显决定返回中国时,他的一位同伴被印度折服,宣布要留在
佛教的宗土,因为这里的学术高超,僧律严明。他发誓说:“自今已去至
得佛,愿不生边地。”^③在这之前和之后,中国都人很少称自己的祖国为
边地。

中国俗家百姓也深受印度的影响,这表现在流行时尚、音乐以及
艺术等诸多方面。我们今天仍然能通过佛教石窟欣赏那些美轮美奂的
佛教艺术。佛教的确立需要大量的金钱,它们往往求助于商人团体的
资助。商人和传教的僧侣共同行走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围不同的丝绸
之路上,这使得宗教和贸易携起手来。中国人把丝绸卖给印度人,以换
取印度的珠宝和佛教遗物。

印度的影响一直到唐朝(618—907)的辉煌年代仍未减弱。长安
的许多佛教寺庙提供许多日常的服务,包括办丧事、庆贺佛教节日,
并开设当铺、客栈、浴室,以及医院和药铺。远在西北边陲(今甘肃
省)的敦煌石窟中的一幅壁画显示,当时中原地区一座寺庙的资产
种类是何等的丰富。一份 10 世纪的敦煌文献展示了佛教教士们仍
然试图说服中国人放弃传统的祖先崇拜,以获得佛教的救赎。这个
民间故事的主人公目连,是一位自小绰号为罗卜的和尚,他身赴地
狱寻找死去的母亲。被想像成为地下监狱的中国传统的地狱,也逐
渐扩展了一些特殊的部分,用来特别针对那些侵占寺庙土地等的触
犯佛教的罪行。

在对印度文明表示钦佩的同时,大多数中国人都无法掩饰对未开
化的游牧民族的恐惧,后者在 9—10 世纪对中国领土开始不断地侵
袭,并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功。

第三部分：面向北方

从 10 世纪开始,中原的定位转向北方。在大多数时间里,中国或